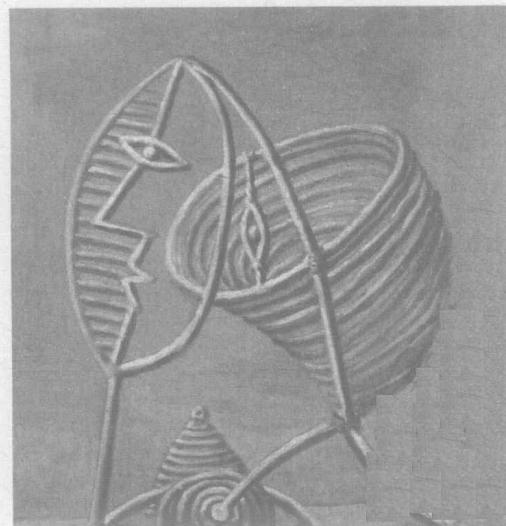


# 符号学问题

[法] 安娜·埃诺 (Anne Hénault) /主编

怀宇 /译

*Questions  
de sémiotique*



# 符号学问题

[法] 安娜·埃诺 (Anne Hénault) / 主编

怀宇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符号学问题/ (法) 安娜·埃诺主编; 怀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300-26522-3

I. ①符… II. ①安… ②怀…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1596 号

## 符号学问题

[法] 安娜·埃诺 (Anne Hénault) 主编

怀宇译

Fuhaoxue Went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电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张	35 插页 2	印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729 000	定价	138.00 元



本书执笔兼主编安娜·埃诺（Anne Hénault）女士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 贺词

Par ces mots, je voudrais exprimer  
Ma joie de voir la publication en chinois  
de mon ouvrage Questions de sémiotique et  
je souhaite qu'elle soit utile au lecteur chinois:  
la sémiotique ouvre un nouveau champ du savoir  
en explorant les architectures de la signification,  
les schémas dynamique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raison humaines.

Anne Menant

在我主编的《符号学问题》一书的中文版出版之际，我谨以此短信来表达我的兴奋之情，并希望它的出版对中国读者是有用的：符号学在对意指结构、对人类思想和理性的动态模式的探索方面，为我们开启了全新的知识领域。

安娜·埃诺

# 中译本序

《符号学问题》(*Questions de sémiotique*)一书，是21世纪以来西方符号学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出版物。执笔者兼主编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巴黎第四大学(巴黎-索邦大学)资深教授安娜·埃诺(Anne Hénault)女士。她也是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的外籍顾问。

根据埃诺教授的介绍，这本书的编辑初衷产生于该书汇总出版之前10年，其基本出发点就是在把所有符号学都看作对于“表达关系”之研究的前提下，通过汇总不同时期符号学研究有代表性的文章，阐述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传统和源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传统在各个领域中的研究成果，进而探讨这两种传统在一定的领域中融合与互补的可能性和前景。为此，汇总在这部书中的文章有30多篇，而其作者则是来自近十个国家的大学的27位著名学者。

全书除了开卷后的绪论之外，共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名为“符号学有何用？”。其下又分为从索绪尔到初期的格雷马斯的巴黎符号学学派的实践、皮尔斯符号学的实践以及两个学派交汇形成的音乐符号学三编。第一编介绍了“符号学与图像”“符号学与广告”“符号学与建筑学”“符号学与生物学”“符号学与文学”“符号学与《圣经》”“行为表现符号学”诸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二编介绍了皮尔斯在“符号学与建筑学”“符号学与生物学”“符号学与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三编介绍两个学派交汇形成的音乐符号学研究成果。我们注意到，索绪尔符号学理论和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应用领域达到了近乎相同的地步。

第二部分名为“激情与感性符号学是一种‘新符号学’吗？”。其下有五章内容，分别介绍了索绪尔学派的激情研究工作、其对“陈述活动”的研究成果，以及皮尔斯在激情和情绪、本能和潜意识、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注意到，作为形式研究方法论的两种符号学传统，均可以被用来研究千变万化的主体情感表现，这就使得符号学的研究扩展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

这种大体上对应排列的方式，所带来的结果便是一种比较研究。读者可以在比较之中，把握两种传统在各个领域分别进行的研究和所获得的成果，也会知晓它们在哪一些领域或哪一个方面能够实现综合，从而为符号学的整体发展开辟新的思路。

这部书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相当多的文章可读性非常强，有的甚至就像是叙

## 符号学问题

事或小说。于通俗易懂之中，娓娓阐释符号学原理，这是很难得的。

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每一个章节前，都有安娜·埃诺教授撰写的“介绍”或“引论”，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这些文字，谈及相关章节的总体研究历史和现状，是我们了解相关领域符号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指引与钥匙。

本书译者是我中心专职研究员张智庭教授（怀宇），他是法国符号学著作的知名译者和符号学研究者。我们相信，他的这部精心译作能够对我国读者深入了解符号学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也能够为我国专业符号学研究者了解国外符号学研究现状和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与方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此书。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主任 王铭玉  
2017年8月于天津

# 撰稿人

阿里韦 (Michel Arrivé): 南特尔-巴黎第十大学 (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

巴斯蒂德 (Françoise Bastide): 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贝尔坦 (Éric Bertin): 索阿契广告公司与利摩日大学 (Agence Soatchi et Université de Limoges)

贝特朗 (Denis Bertrand): 巴黎第八大学 (Université Paris VIII)

博尔德龙 (Jean-François Bordron): 巴黎第三大学 (Université Paris III)

布东 (Philippe Boudon): 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南锡建筑学院 [Larea (louest/CNRS-EAN) Paris-Nancy]

桑塔埃拉·布拉加 (Lucia Santaella Braga): 巴西圣保罗教皇大学 (Université pontificale de São Paulo)

勃兰特 (Per Aage Brandt): 丹麦奥尔胡斯大学 (Université d'Aarhus)

科拉皮耶特罗 (Vincent Colapietro):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é de Pennsylvania, USA)

科凯 (Jean-Claude Coquet, 又译: 高概): 巴黎第八大学 (Université Paris VIII)

达罗德-哈里斯 (Ivan Darrault-Harris): 利摩日大学

埃米切 (Claus Emmeche):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博尔学院 (Niels Bohr Institute, Université de Copenhague, DK)

冯·德·费尔 (Drude von der Fehr): 挪威与美国合办奥斯陆布里德恩大学 (Université Blindern d'Oslo, N et USA)

弗洛什 (Jean-Marie Floch): 伊普索斯符号学研究中心 (IPSOS)

丰塔尼耶 (Jacques Fontanille): 利摩日大学

格雷马斯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EHESS)

哈马德 (Manar Hammad): 建筑设计师 (Architecte)

哈滕 (Robert S. Hatten): 美国布卢明顿大学 (Université de Bloomington, USA)

埃诺 (Anne Hénault): 巴黎高等教师培训学院和巴黎第四大学 (IUFM et Paris IV)

霍夫迈耶 (Jesper Hoffmeyer): 哥本哈根大学分子生物学学院 [Université de

## 符号学问题

Copenhague (Inst. biologie moléculaire)]

约翰森 (Jörgen Dines Johansen): 丹麦欧登塞大学 (Université d'Odense, DK)

拉森 (Sven Eric Larsen): 丹麦奥尔胡斯大学

帕尼耶 (Louis Panier): 里昂大学 (Université de Lyon)

萨万 (David Savan):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é de Toronto)

塔拉斯蒂 (Ecro Tarasti):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Université d'Helsinki)

蒂耶瑟兰 (Claudine Tiercelin): 巴黎第十二大学 (Université Paris XII)

齐勒贝尔伯格 (Claude Zilberberg):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符号学研究小组”  
(GDR, “Sémiotique” du CNRS)

书中非法文文章的法文译者为安娜·埃诺。

# 主编前言

埃·诺

## 对于表达关系的研究

我们把今天在地球上被称作“符号学”的各种学说都想象为属于同一种潮流。在论证实际上几乎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之前，我们先大胆地断言，符号学首先是对于表达关系（rapport d'expression）的研究。在做这种断言（assertion）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在表达一种观点，在目前可以做到的情况下，这种观点似乎可以将各种符号学研究特别是依据皮尔斯（C. S. Peirce）思想所做的全部符号学研究与源自索绪尔（F. de Saussure）思想的全部符号学研究统一起来。简言之，它们是我们在这部书中感兴趣的两大主要潮流。

这样的一种断言，也是对这门新学科之起源的探讨要求我们必须给出的。实际上，虽然 1965—2000 年期间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符号学”出版物问世，但是，对于这样一门似乎仍然神秘和格外新颖的学科，读者有权得到对于这一问题的答复：“这一切都是怎样开始的？”

今天，如果把各种“符号学”的代表性专家聚集在一起，要求他们定义一下他们各自的学科，或者指出他们学科的开始时间，那么，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混乱和随后漫长的商讨，而得到的却是令人大失所望和少得可怜的共同意见。说真的，上溯到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或者上溯到圣·奥古斯丁，中间顺便提及像圣·保罗<sup>①</sup>、奥利金<sup>②</sup>或托马斯·阿奎那<sup>③</sup>那样的“先驱”，这样做并非荒唐。我们还不要忘记，“符号学”（sémiothèque）一词是 1690 年在洛克<sup>④</sup>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

① 圣·保罗（Saint Paul, 5—67）：早期基督教领袖。——译者注

② 奥利金（Origène；希腊文：Origenès, 185—251）：古希腊语言学家。——译者注

③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d'Aquin, 1224 或 1225—1274）：意大利哲学家。——译者注

④ 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英国哲学家，著有《人类理解论》（*Essai sur l'entendement humain*）。——译者注

## 符号学问题

(4. 21. 4) 首先出现的。当我们把符号学定义为对于符号（对于皮尔斯的某种快速解读）或是对于意指（signification）〔这一次，是对于包括索绪尔、叶姆斯列夫（L. Hjelmslev）和格雷马斯（A.-J. Greimas）在内的流派的快速解读〕的研究的时候，这种珍贵的谱系尤其恰当。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关于“符号”（signe）、“意指”、“意义”（sens）、“价值”（valeur）这些术语，也曾有许多著述试图挨个为其确定一种比其他术语更为明确的理论地位。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符号学研究发展非常迅速，以至这一点从未得到真正的阐述。或者换个说法，那就是，像索绪尔<sup>①</sup>或本维尼斯特（E. Benveniste, 又译邦弗尼斯特）、叶姆斯列夫或格雷马斯这样重要的理论家，并没有更多地关注这种区分性任务。一切就像是他们为一种完全新颖的观点所驱使，便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建立一种有关表达关系<sup>②</sup>的任务之中了。在他们之前，一些思想巨匠凭着直觉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表达关系，但是，这种说法当时还不存在，它还没有完全形成。

因此，这些理论家也急于确定他们与各个学科的关系——这些学科，例如修辞学（rhétorique）或阐释学（herméneutique），从远古时代起就致力于深入探讨意义之意义。正因如此，我们更有理由认为，符号学家首先是各种思维方式（mode）所出现的细微和深刻变化即彻底改变的继承者，这种改变导致其中像莱布尼茨（G. Leibniz）那样的人开始意识到表达关系的形式特征。<sup>③</sup>

我们很幸运，能极为准确地确定这种认识论变化即改变的实践（pratique）（M. 福柯），这种变化已在阿尔诺<sup>④</sup>与莱布尼茨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对话中显示了出来，

① 我们也将会在《普通语言学札记》（*E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2002, Gallimard）中看到对于这一点的再一次确认。比如“论言语活动（langage）的双重本质”（III. f）一节。再如恩格勒（Engler）整理的版本IV. 3330：“早在语言学之前，所有的社会科学，至少那些有研究价值的社会科学，都在最后被纳入心理学；但是，这并不影响在普通心理学与这些科学之间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也不影响每一种科学都需要即便是集体普通心理学也无法提供的某些概念（concept）……目的是确定表达领域和为其构想规则，这种确定并不在与我们的普通心理现象有着共同点的东西之中，而是在特定的和单一的东西之中，即在语言（langue）的现象之中。”下划线是我们加的。〔上述著作，是根据恩格勒参照后来搜集到的学生们的笔记和索绪尔自己的手稿整理的对于《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考证本（1974）以及1996年发现的新资料汇编而成的，这段文字见该书260~261页。——译者注〕

② 这一点，在这部著作的所有内容中，从不同角度得到了探讨。它还是为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La sémantique structurale*）第一章“科学语义学的条件”（“Les conditions d'une sémantique scientifique”）奠定基础的重要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希望找到人们至今从符号学（sémio-tique）和从记号学（séméo-tique）两个方面为表达关系所构想的方式之形象的话，我们就要参照本书第一部分的引论，以及第一章由弗洛什进行的对于康定斯基作品的研究的第三部分内容。对于记号学，拉森在第八章中，断然拒绝皮尔斯的哲学思想为这种关系进行分类的方式。（本书第八、第九和第十章使用的都是“séméo-tique”一词，但由于在一般观念中，“séméo-tique”是“sémio-tique”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所以，译者将它们均译为“符号学”。另外，原书斜体字，本译稿以下划线标出。——译者注）

③ 牛顿（Isaac Newton）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es mathématiques de la philosophie*）同在1687年出版。

④ 阿尔诺（Antoine Arnauld, 1612—1694）：法国冉森派教士、神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而他们之间的书信，正像帕里昂特<sup>①</sup>所分析的那样，保存着准确的痕迹。阿尔诺忠实行笛卡尔，也尊重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笛卡尔曾将这两个国家说成是神秘的（即无法合理地去认识的）国家：它们一方面表现为不理解上帝，另一方面又纠结于心灵与肉体相结合的棘手问题。阿尔诺忠实行“伟大时代”<sup>②</sup>的认识论；相反，莱布尼茨是泛理性主义者，他已经属于启蒙时代。阿尔诺从未回复莱布尼茨 1687 年 10 月 9 日的信件，而在那封信里，莱布尼茨亲自向阿尔诺解释了他对于由他引入《论形而上学》(*Discours de métaphysique*)一书之中并加以定义的表达关系的理解方式。阿尔诺只是不能理解对于表达关系的世俗解释即非神秘性的解释，因为这种表达关系既使他脱离了先前的各种形而上学的问题<sup>③</sup>，也使他脱离了任何与主观性(subjectivité)有关的概念。实际上，莱布尼茨在 1687 年 10 月 9 日致阿尔诺的信件中，表述了下面的定义：“当关于一个事物可以说出的东西与关于另一个事物可以说出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固定的和可调节的关系时，一个事物就是在（我的语言中）表达另一个事物。”按照这种定义，明确的表达与意识的统觉(aperception)就非常明显地分开了。表达关系被认为不必然包含一种人的主观性媒介(médiation)，也不包含一种神灵的主观性媒介（而这一点在阿尔诺方面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关系，是按照把在一个现实(réalité)平面上讲述事实的一种已知条件(donné)投射(projection)到另一个现实平面上的数学关系的模式(modèle)来构想的。例如，这便是一个固体与它在一个二维平面上的投射之间维持的关系。甚至有人说，一部机器的模型表达这部机器，或者说，一个代数公式表达一个圆（莱布尼茨：《思维之思考》，*Quid sit idea*, Gehr, VII, p. 263–264）。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表述都没有去参照一种表达的主观性。在这方面，被人预感到的是皮尔斯描述过的功能-符号(signe-fonction)，因为按照功能-符号的词义，对于任何意愿性的参照都是次要的。这一点，也让我们初步看到了与索绪尔符号学思想的广泛联系，特别是与其有关“言语活动的双重本质”的反复思考之间的联系，因为这种思考首先是对意义移置(transposition)感到失望的意识。根据移置的原理，意义可以无休止地从一个意蕴平面(plan signifiant)被派用到另一个意蕴平面——这种观点令人眼花缭乱，可是，莱布尼茨和很久以后的皮尔斯都据此得出了主导他们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根本性结论。

我们在这部书中将主要谈及的两种符号学，就是在这极为抽象的一点上交会在一起的，但是它们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不同的。不过，为了实现这“第一阶段”所

<sup>①</sup> 参看帕里昂特(Pariente)所著《作品中的言语活动》(*langage à l'œuvre*, Paris, PUF, 2002)一书的“痛苦的问题，阿尔诺与莱布尼茨之间的误解”(“Le problème de la douleur, un malentendu entre Arnauld et Leibniz”)一节。

<sup>②</sup> 指法国 17 世纪即路易十四时代。——译者注

<sup>③</sup> 尤其见德勒兹(Gille Deleuze)所著《斯宾诺莎与表达问题》(*Spinoza et le problème de l'expression*, Minuit, 1978)一书，特别是看其结论“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的表达理论”(“Théorie de l'expression chez Leibnitz et chez Spinoza”)。

## 符号学问题

要做的研究工作之一，便是去证实这种理论鸿沟正在被填平。例如，我们在已经引用的拉森的文章中将会观察到这一点，因为那篇文章把皮尔斯的符号哲学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联系了起来。

我们规定给自己所要捍卫的观点，当然都有其简短的历史，它们的历史既包含着偶然性，也包含着与确定的设想内容的相遇。我们将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其历史，然后展述一下赋予这部文集总体特色的全部设想。

## 简 史

出版这部书的想法，是在 10 年中得以具体化的。这本书是于 1990—1992 年我在加拿大期间有了眉目的。那段时间，在与美国符号学会主席萨万（David Savan）进行了多次沟通之后，我们对皮尔斯有关符号学的哲学思想基础看得更为明晰了。萨万这位大学者的慷慨大度，使我们同意对皮尔斯进行认真的研究，因为尽管有了多个研究小组——例如佩皮尼昂市（Perpignan）以德勒达勒（G. Deledalle）和雷托雷（J. Réthoré）为首的研究小组、比利时的埃弗雷特-德斯梅茨（N. Everaert-Desmedt）研究小组、加拿大魁北克的菲塞特（D. Fisette）研究小组——的努力，但是，皮尔斯在法语国家和法语地区语言学家们那里还是不大为人所知的。迈出这一步是艰难的，首先是在经过几年努力建立起来的以格雷马斯为中心的巴黎符号学学派（École de Paris）内部难以迈出，随后是做这种研究难以积极地进入当时正在从事的各项研究工作之中，因为那些工作都严格地忠实于索绪尔、叶姆斯列夫和欧洲其他几位大理论家的发现。

1997 年，我们在挪威有了另一次相遇。这一次相遇促使我们重新考虑皮尔斯学派的分析实践和其当前的问题。德鲁德·冯·德·费尔（Drude von der Fehr），作为一位文学专家，在美国布卢明顿大学学习之后，在奥斯陆大学讲授皮尔斯符号学。在美国时，她曾经是西比奥克（T. Sebeok）的学生。她从美国回来之后，一直保持着与布卢明顿大学的对话者们的联系，也与北欧的皮尔斯学派研究广有接触。德·费尔同意积极参与这一计划，她一方面撰写了“艺术与本能”（“Art et instinct”）一节，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联系了科拉皮耶特罗（V. Colapietro）、桑塔埃拉·布拉加（L. Santaella Braga）、约翰森（J. D. Johansen）、哈滕（R. Hatten）、埃米切（CL. Emmeche）、霍夫迈耶（J. Hoffmeyer）和拉森。就这样，这或多或少使我们有可能坚持我们在加拿大时就确定下来的借助于皮尔斯的著述和其成果来研究其符号学的想法。

后来，1999 年，博尔德龙（J.-F. Bordron）在巴黎第四大学博士学院开办了一个符号学研讨班，它标志着迈出了新的决定性的一步：以研究口味（goût）尤其是研究葡萄酒品尝为由，我们更为深刻地探讨了索绪尔主义与皮尔斯主义之间的潜在联系。博尔德龙为这个研讨班写的文章被收进了这本书，证明了这种方向。最后，2001 年 5 月，瑟尔（J. R. Searle）到了巴黎，来到了这同一个研讨班上，于是出现了交流机会。加入交流的还有弗洛斯达尔（D. Føllesdal）和帕里昂特，这种交流最后促成了一部名

叫《符号学与精神哲学》(Sémiotique et philosophie de l'esprit) 的书。

我们并不隐瞒，这种过程的“路遇故事”(J. Kerouac<sup>①</sup>)可能是偶然和有欠恰当的，因为这种做法注定要给那些实际上只是有过邂逅的研究小组以为人所知的方便。因此，我们不无遗憾地说明，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为其他符号学学派安排一定的位置，例如以洛特曼(Y. Lotman)为首的塔图学派、以埃柯(Umberto Eco)为孜孜不倦鼓动者的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e)学派，还有20世纪60年代由伊万诺夫(V. V. Ivanov)、乌斯潘基(B. A. Ouspenski)、皮亚蒂戈尔斯基(A. M. Piatigorski)、索米杨(S. K. Saumian)、斯特潘诺夫(Y. S. Stepanov)和托波洛夫(V. N. Toporov)这些理论家在苏联推动的学派。最后，我们还要补充说，取得重大发展的图像(image)及象似性(iconicité)符号学[例如博尔德龙、豪斯曼(Carl Haussman)、菲塞特(J. Fisette)、索内松(G. Sönesson)等人的研究成果]未能在这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将以《图像符号学》(Sémiotique de l'image)<sup>②</sup>为名在“符号学形式”("Formes sémiotiques")丛书中单独出版。

## 一项持久的计划

### 口头传授

这一计划在符号学上是很难表述的。1976年以来出版的许多著述，都无法改变这一主要困难：符号学的传授(transmission)(讲授)当前还是属于口头的传统。<sup>③</sup>我们以下面的事实为证：那些非常健谈的人[和那些在自己学科里最具权威的人，例如某位传播(communication)活动策划者或某位知名的语言学家]，一旦投入对于符号学文本(texte)的自学式的阅读之中，便制造出一些无法消除的误解。这本逊色的教材的目的之一，在于保存和传授这种口头的传统，而那些不直接与符号学研究活动有联系的人则不具备这种传统。显然，符号学的研究活动涉及索绪尔学派，但是，尽管方式不同，我们也对皮尔斯学派有着相同的考虑。我们尽力复活或重启从一开始就建构了对于这种需要建构的新知识有着明确和无法言表的直觉的人们之间达成的默契。关于巴黎符号学学派，这些默契尤其指在图尔市(Tours)成立的研究小组<sup>④</sup>，即20世纪70年代与格雷马斯关系非常密切的不多的几位研究者。根据其

<sup>①</sup> J. Kerouac，即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1922—1969)，其作品人物都是美国最下层的民众，即为社会“所排挤的众生”。——译者注

<sup>②</sup> 正式出版时，书名为《视觉艺术符号学》(Atelier de sémiotique visuelle, PUF, 2002)。——译者注

<sup>③</sup> 但是，大多数科学难道不都是这种情况吗？老师们都是逐渐地向他们的学生讲授定型了的数学理据或物理理据，如果不是与各位教师进行过长时间的对话，那么，物理学传授或数学传授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sup>④</sup> 这些学者曾在达罗德-哈里斯的邀请下，聚集在一起就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这样的聚会不是很多，但使这个小组保持着一种很强的象征性存在，这种存在对于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知识构成一种调节。我们在图尔小组中，将仅提及以下几人：达罗德-哈里斯、凯雷(H. Quéré)、库尔泰斯(J. Courtès)、贝特朗(D. Bertrand)、埃诺(A. Hénault)、弗洛什(J.-M. Floch)、科凯(J.-Cl. Coquet)、丰塔尼耶(J. Fontanille)、巴斯蒂德(F. Bastide)、朗多夫斯基(E. Landwski)、齐勒贝尔伯格(Cl. Zilberberg)。

## 符号学问题

进入研究小组的时间，也根据其与《结构语义学》的作者格雷马斯所严格确定和坚持的研究主轴建立联系的历史长短，我们可以对这些符号学家谨慎地做些等级区分。所有参加过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当时设在巴黎图尔农街（rue Tournon）]研讨班的研究者，尤其是图尔研究小组的人，比在对外开放的研讨班上听过讲授的人都更多和更持续地得到过格雷马斯的口头传授。这一点说明，尽管这些研究者之间有分歧，但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着同质性。

我们尽力忠实地复原这个研究小组的共同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它的“正统学说”（orthodoxie）——这种复原，显然不受任何教条限制，但我们是本着一种实用有效的精神来进行的。在读者方面，我们的计划要求他们做出真正的努力来与我们会合。这就涉及要有一种非常确定的阅读契约。我们不想从远古时代说起。我们要求，读者对最基本的知识要有所了解，并且至少阅读过德尼·贝特朗在他的《文学符号学概论》一书第269页上列出的入门书中的一种。<sup>①</sup> 我们的耐心读者，如果他本人也接受过文学教育和具有文学禀赋，那他肯定也能阅读贝特朗的这本书。如果他对有关图像和总体上是视觉对象（visuel）的符号学感兴趣，那他肯定会找到弗洛什在法国大学出版社（PUF）出版的（至少）一部著述，并且他会想方设法去弄到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书《眼睛与精神的微妙神话》（*Petites mythologies de l'oeil et de l'esprit*, Paris, Amsterdam Hades-Benjamin, 1985），但最后却因弄不到而失望。我们在弗洛什的这部著述中选取了两篇（W. 康定斯基和 B. 拉比耶）人们最常引用的文章，用在这部《符号学问题》中，因为自它们对于视觉符号学（sémiotique visuelle）尚处摸索阶段的概念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以来，它们就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的模范读者不想思考面太窄，那么，他就必须阅读 U. 埃柯的《符号》（*Le Signe*）以及《符号学与语言哲学》（*Sémiotique et philosophie du langage*, Paris, PUF, 1988）。

如果读者是建筑师或城市规划设计师，那他一定会去寻找《空间符号学》（*Sémiotique de l'espace*, Paris, Denoël/Gonthier）和雷尼耶（Alain Rénier）或哈马德的全部研究成果。如果是《圣经》研究者，他就一定会去了解安特维尔纳研究小组的（很富教学性的）所有出版物。而如果他对电影感兴趣，那么他一定会努力释读梅茨（Christian Metz）的有时得到科林（Michel Colin）进一步阐释的研究工作。对于音乐家来讲，导论性著述便有塔拉斯蒂<sup>②</sup>和马尔塔·格拉博兹（Marta Grabocz）的著述，还不要忘记科斯坦·米耶拉尼（Costin Miéreanu）的著述。对于政治家和其

<sup>①</sup> 德尼·贝特朗著《文学符号学概论》（*Précis de sémiotique littéraire*, Nathan Université, 2000）。该书作者甚至在本书（第五章）中对他自己的书做了出色的简介。初学格雷马斯学说的人最常用的入门书是：库尔泰斯的《叙述与话语符号学》（*Sémiotique narrative et discursive*, Paris Hachette, 1976）、安特维尔纳（Entrevernes）研究小组的《文本的符号学分析》（*Analyse sémiotique du texte*, Lyon, PUL, 1979）、埃诺的《符号学赌注》（*Les enjeux de la sémiotique*, Partis, PUF, t. 1, 1979, t. 2, 1983）。对于那些很想获得符号学口述传统的人来说，阅读这些过去的书，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格雷马斯过去就认为，这几本真正“严肃的”小书，尽管无大志向，但对符号学计划提供了可靠的和补充性的阐述。

<sup>②</sup> E. 塔拉斯蒂（Ecro Tarasti）曾为这本“大学本科”教材提供了有关音乐符号学研究历史全貌的激动人心的文章，见本书第十一章。

他政治事务的专家，朗多夫斯基的著述是需要阅读的，特别是他的《他者的在场》(*Présence de l'autre*, Paris, PUF, 1997)。最后——最后但并非最无用的(*Last but not least*)——对于研究英语的学者来说，阅读凯雷的著述是必不可少的。总的来说，这部著述的大部分文章是图尔小组的成员（至少是写作本书目录中第一部分文章的成员）写的，他们都在各种地方发表过入门性文章（从短小的文章到真正的论述），这些文章都以其第一手知识阐述了符号学的实践活动。

### 这并非一部选集

如果我们同意《小罗贝尔词典》(*Petit Robert*)把选集(anthologie)解释为“所选段落的汇编（因为这些段落出色，值得出现在一个选集当中）”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这本书显然是汇集了多方作者贡献的一个汇编本，也应该接受他们的贡献是经过选择的。对于一种选集来说，共同点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首先关心的是，根据“大学本科”教材的宗旨，按照有效启蒙的要求，提供可陪伴初学者的一种统一的教材。因此，我们在选择(*choix*)中放弃了展现“段落选编”的意图，而是完整地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在今天通常是难以接触到的，但对于我们作者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它们都曾实际地发挥过作用，指导我们培养了个人在符号学方面的能力。

第二项标准是根据我们的决心确定的，我们早已决定将索绪尔学派与皮尔斯学派的实际成果进行一一比较。这使我们确定了所要选择的应用领域：生物学、建筑学、图像和文学。它们之所以突出地显示了出来，是因为这些领域为两个学派中的每一个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应用例证。但是，这本《符号学问题》在介绍方面注定是不均衡的，原因是，如果说我们对索绪尔学派非常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对皮尔斯学派的介绍便只能完全依赖我们所间接获得的信息。直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存在某种智力空间，可以使这一学派的全部研究工作得到思考和讨论。我们对于这一学派的研究成果，只具备有限的了解，而且也许还是层次不清的。因此，针对这一学派所选的代表性文章，有可能不如针对索绪尔学派所选的代表性文章那么可靠。实际上，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部反映了我们最初意图的汇编书，必然冒着不完备和有缺陷的风险。这种做法肯定会带来批评和建议，而这将会促使我们推出这本书更为完善的新版本。

### 符号学的现在、过去和将来

我们曾认为，有可能将这部著述限制在前十一章范围之内。如此呈现的符号学形象，就会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止步不前的那些人头脑中保持的形象一样是清晰的。但是，那种形象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恰当地被僵化了。实际上，这20年来，新的理论探索层出不穷。应该承认，现在，实践即应用并没有跟上这些理论的迅猛发展。不过，我们认为应该对这种萌发状况做些说明，即便这使我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来获得对于整体计划的绝对实际的探讨。这部著述的第二部分，被看作两个被考察的学派之间有序的主题性论战，它至少可以让读者理解激情(passion)问题、口味问题或象似性问题在两个学派研究者们令人惊讶地平行的考虑当中是如何逐渐占据